

# 哲学与哲学家的生活

刘永谋



《启蒙之梦：现代哲学的兴起》，安东尼·戈特利布著，肖聿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11月出版

哲学家的生活与福柯所谓的“哲学生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哲学生活是践行自己哲学理论和主张的生活，比如福柯在《说真话的勇气》中推崇的犬儒主义者的生活。应该说，一些哲学家并没有过哲学生活，而许多践行哲学生活的人并不是哲学家。

这本书很适合爱“吃瓜”的群众看，里面很多八卦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实际上，书中有关的哲学家生平研究写得很严谨，没有随意地暗示、臆想和申论，对流言、自陈和后人的攻击等分而述之，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大约是为评职称、赚点稿费等等而为之。理论上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不同的人站在不同时代立场上透视思想史，可以解读出不同的哲学史。但是，真正要推陈出新却不是“上下嘴唇一碰”那么简单。因此，开始琢磨要写本西方哲学史的时候，就必须先想清楚一个问题：我要写的东西，和别人写的有什么不同？有没有必要做一件看起来重复的工作呢？

英国作家、学者、《经济学人》杂志前执行主编安东尼·戈特利布想得很清楚，那就是重新追溯哲学家们的生平，在此基础上穿插、解读和评价现代哲学思想。这就是他在撰写《理性之梦：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的哲学史》后的第二部《启蒙之梦：现代哲学的兴起》。

## 二

显然，透视哲学家的生活更容易出新，因为当代生活的流行风尚变幻是如此迅速，以至于可以辨认出20年前的生活都有一些可以品头论足的陌生感。相比较而言，思想风尚的变化则要慢很多。

然而，哲学家的生活与他的思想有多大关系呢？笼统地说，人的思想当然受到其人生经历的影响，可能把哲学家的某个经历与他的某个具体思想直接作出某种因果勾连吗？比如说，奥地利裔美籍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是个疯子，所以他产生了“科学与巫术、神话没有本质区别”的想法，法国哲学家福柯进过精神病诊所，所以他产生了“疯子比正常人更正常”的念头——可以这么说吗？显然，如此推论是有问题的。

在哲学研究中，很少去如此“诛心”地解释思想，用的时候一般会加上“可能”“也许”等字样。当然，有一种情况是可以作为强证据的，就是哲学家自己有自传、自述，明确说了自己的某个思想是由某种经历造成的。比如说，同性恋福柯自己说，他搞

学问就是为了吸引漂亮男孩。

很多例子告诉我们，哲学家们的生活远不如他们的理论那么高尚纯粹，那么文如其人。卢梭写过《爱弥儿》等论教育的作品，却遗弃了5个亲生孩子，他的对头伏尔泰对此进行了猛烈批评。1760年，卢梭写信给伏尔泰，坦言“我恨你”。这个故事也告诉大家：关联思想与生平很容易导致人身攻击，这也是我不认为此类透视是哲学研究中可靠方法的原因之一。

实际上，哲学家的生活与福柯所谓的“哲学生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哲学生活是践行自己哲学理论和主张的生活，比如福柯在《说真话的勇气》中推崇的犬儒主义者的生活；他/她们主张抛弃世俗名利“像狗一样生活”，就真的吃住在广场、赤身裸体且当众撒尿。应该说，一些哲学家并没有过哲学生活，而许多践行哲学生活的人并不是哲学家。即便号称实修的中国哲学家，许多也是说一套做一套的，比如主张“存天理，灭人欲”朱熹就有很多贪财好色的传闻。

实际上，戈特利布的哲学家生平研究写得很严谨，没有随意地暗示、臆想和申论，对流言、自陈和后人的攻击等分而述之，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至于人民群众读完会作何感想，就请君自便了。因此，这本书很适合爱“吃瓜”的群众看，里面很多八卦我也是第一次听说。比如，流言说笛卡尔经常随身带个和他的私生女一模一样的木偶，情种卡萨诺瓦居然警告过小姐姐不要读霍布斯堕落的、“有毒的”著作，据说靠磨镜子艰难活着的斯宾诺莎实际上凭借崇拜者和学生的捐赠过得很舒服，被美国国父们推崇的“自由斗士”洛克曾著文称穷人穷完全是自己懒惰等造成的，言辞犀利的怀疑论者休谟其实是“好人大卫”或“圣大卫”，伏尔泰富有主要因为他是精明的银行家而不是靠卖文发财的……里边很多故事都很“上头”，人民群众会有兴趣翻一翻的。

## 三

在八卦绯闻和奇闻轶事中，读者能潜移默化地学到许多现代哲学兴起的知识。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

第一点，现代哲学的兴起是与科学发展齐头并进的，在与教会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现代早期哲学家多数不是职业的学院哲学教授，他们干着不同的营生，相当一些人依靠国王、贵族和有钱人提供的工作和资助而生活，但他们都对当时的自然科学进展十分熟悉，喜欢与科学家交流，积极参与一线的科学工作，有的如笛卡尔、莱布尼茨作为科学家的名声甚至更大。彼时哲学家与科学家一起，以理性为武器，驱赶愚昧、争取自由，才逐渐撕开了教会在欧洲的思想禁锢。这一点值得今天哲学教授认真学习。

第二点，做哲学的人得有执着追求真理的决心，甚至是舍生取义的圣徒精神，否则是成不了大哲学家的。很多哲学家终身未婚，如这本书里提到的笛卡尔、斯宾诺莎、洛克、莱布尼茨。除了生活上的牺牲，现代早期的哲学家往往因为宗教原因受到极大的压力，比如斯宾诺莎因为“自然神论”的思想23岁被革除教籍，军籍公告满满的威胁。此外照录一段，大家感受一下——

根据天使的法令和圣徒的教导，我们取缔、摒弃、谴责和咒厄巴鲁克·斯宾诺莎……愿他日夜皆遭诅咒，愿他睡觉时和醒来后皆遭诅咒，愿他去来进出皆遭诅咒，愿主不宽恕他，愿主的怒火将他焚烧……

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何其不易！建议人民群众对身边的哲学工作者更体谅一点，更宽容一点，多支持一点。

## 域外

# 作为未来学家的威尔斯

■武夷山



“威尔斯洞见了世界的种种丑陋卑污，但仍试图想象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在他理想的理想世界中，实施着全民普及教育，科学事业受到培育促进，人类通过自己的才智和创造力造就了一个更清洁、更远离灾害的地球。”

2019年10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哥伦比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英语文学和比较文学教授 Sarah Cole（莎拉·科尔）的专著：《Inventing Tomorrow: H.G. Wells and the Twentieth Century》（本文作者译为“创造未来：H.G. 威尔斯和20世纪”）。

威尔斯（1866—1946）是英国著名小说家，创作了《时间机器》（1895年）、《莫洛博士岛》（1896年）、《隐身人》（1897年）、《世界大战》（1898年）等大量文学作品，也有《世界史纲》（1920年）这样的学术作品。他对于定义20世纪的思想特征、政治特征和文学特征作出了杰出贡献。世界各地的百姓对时间与未来、进步与衰退、人类在宇宙中位置等问题的认识，都打下了威尔斯作品的深深烙印。威尔斯的读者遍及全球，他也采访、接触过很多世界名人，包括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苏联领袖列宁和斯大林、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等等。科尔的这部文学研究著作力图表明，威尔斯80至100年前的作品至今仍能够对我们有深刻的启迪。

本书首先将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1882—1941）的小说与威尔斯早期撰写的新闻报道文字并列讨论，然后探讨了虚构作品的威力、虚构作品要求些什么、虚构作品为什么重要等宽泛的话题。科尔指出，威尔斯描述或论述过的主题包括：战争造成的影响；时间的性质；生物学，等等，这些主题至今仍是我们所关注的。原先的文学批评家和学者基本上只讨论作为作家的威尔斯，而忽略了他的完整思想成就。不错，威尔斯是不朽的科幻作家，但他也是了不起的思想家。本书超越了对威尔斯科幻作品的论述，探究了威尔斯的全部思想，包括其政治学和历史的论著。

本书的写法，是将文学批评与传记性内容相结合，解释了威尔斯是如何将其个人的生活细节和其现代主义哲学观杂糅进作品中的。

威尔斯生于1866年，经历过恐怖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战争之残酷有切身感受。他喜欢在作品中用平民（非军人）身份的角色来反映战争带来的痛楚冲击以及与此相应的全社会道德认知的缺失。本书认为，威尔斯作品中的角色实际上成了开

创新的伦理景观的工具。

按照科尔的描述，威尔斯将自己不仅视为作家，而且视为新闻工作者。他阅读面极广，从而能够将自己对科学的了解呈现在读者面前。比如，在《时间机器》开篇的演讲中，他就描述了当时科学界对时空的认识；在另一本书中，他推介了进化论思想。因此，他的作品成为后人了解20世纪初期重要议题的一个很好的指南。

科尔认为，威尔斯对现代主义及其价值给予了全新的解释。在战争、科学、时间等不同主题上，威尔斯的思想都同一些最雄心勃勃的现代主义者发生共鸣。但与很多现代主义者不同的是，他认为文学在公共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他的作品也确实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威尔斯洞见了世界的种种丑陋卑污，但仍试图想象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在他理想的理想世界中，实施着全民普及教育，科学事业受到培育促进，人类通过自己的才智和创造力造就了一个更清洁、更远离灾害的地球。科尔认为，威尔斯树立了一个关于文学之道德责任的榜样，文学有义务想象出一个更美好的全球未来。当然，科尔指出，在思想认识上威尔斯也并非“道德完人”，例如，他一方面竭力反对种族主义，但他也曾大力宣扬优生学。

阅读科尔此书的乐趣之一在于大胆地畅想一下：假定世界是按照威尔斯的设想来运行的，那我们今天的生活和文学将是何等丰富和辉煌。

文学教授科尔大概不熟悉未来学家的情况，其实，不少学者将威尔斯视为未来学的奠基人。著名科幻作家、未来学家亚瑟·克拉克（1917—2008）对威尔斯的著作进行过认真研究。他认为，威尔斯有一本1904年出版、34页的小册子可视作威尔斯未来学思想的拱顶石，即《Anticipations of the Reactions of Mechanical and Scientific Progress upon Human Life and Thought》（本文作者译为“机器进步与科学进步对人类生活与思想的影响之展望”）。克拉克说，该书是预测性写作之短暂历史中第一次对未来发展趋势的全面梳理，代表着人类自我意识的一个巅峰。克拉克若能活到今天，与莎拉·科尔共话威尔斯，将是多么令人企盼的文坛盛事呀！

# 全科医生——英国医疗保障体系的基石

■高建红

大医院里人满为患，基层医院门可罗雀，如今这种现象在我国相当普遍。要改变这一状况，推广分级诊疗和家庭医生签约制度就显得十分必要。家庭医生也称全科医生，主要在基层承担卫生保健、常见病和多发病的诊疗以及转诊等工作，在国家医疗卫生体系中占有基础性的地位。但是，目前在我国，全科医生社会地位不高，待遇也无法与专科医生相比，很多医学毕业生不愿意成为全科医生，因此缺口很大。

全科医生制度在欧美许多国家都得到了推广。这一制度最早出现在英国，其关键之处在于让全科医生成为居民初级卫生保健的主导者。人们看病就医首先是由一位签约的全科医生进行前期诊断，当全科医生认为病人有必要进一步治疗时，会开具转诊单，将病人转到专科医生那里进行诊治，若无必要，就由全科医生直接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这种制度可以避免过度医疗，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医疗费用。

这套制度化的体系之所以能出现，与19世纪英国医生职业格局的调整与变化是分不开的。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历史学博士王广坤的专著《全科医生：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医生的职业变迁》就以英国的全科医生为主线，从三个方面出发，即全科医生出现与崛起的社会背景、由全科医生推动的医疗改革以及英国医生职业变迁给英国社会带来的影响，对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医生群体进行了宏观研究。维多利亚时代一般始于维多利亚女王登基的1837年，终于其去世的1901年。考虑到对英国医生职业产生重大影响的《药剂师法案》颁布于1815年，决定英国医生职业变迁格局的《国民保险法》确立于1911年，作者将维多利亚时代确定在1815—1911年。

在19世纪初，英国的医学界分为被国家社会认可的正规医学界和不被国家社会认可的非正规医学界，前者存在内科医生、外科医生、药剂师三大等级，后者有民间医生、化学家与药商群体等各类从业者。内科医生主要负责疾病诊断和开处方，除了把脉，一般不会接触病人身体。外科医生常被视为工匠手艺人，主要诊治外在的疾病，包括做手术、正骨、包扎伤口、拔牙以及处理脓肿等。药剂师主要制药、配药。内科医生大多受过系统化的、正规的大学教育，地位最高，而外科医生、药剂师以及非正统

医学界的从医者社会地位则比较低下。为了维护自己的优势地位，内科医生强调只有他们才有资格进行病理诊断。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维多利亚时代城市的公共卫生状况日益恶化，导致各种传染病流行，人民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为了促进医学的发展和改良社会公共卫生，英国政府颁布了许多法案，从而推动了全科医生的崛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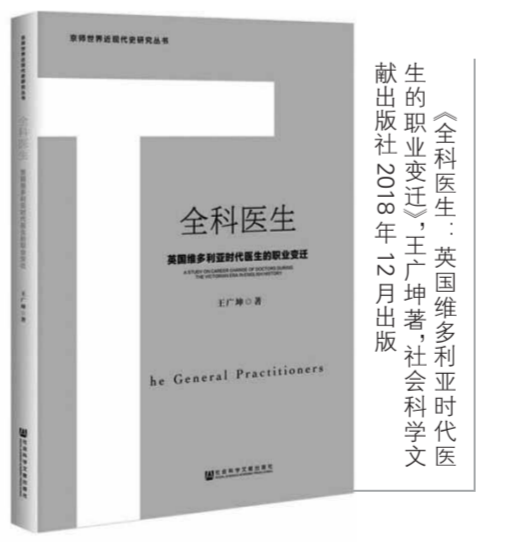
全科医生主要来自原本配合内科医生工作的药剂师群体，他们希望进行医疗改革，打破旧的职业格局，完善他们作为职业医生的身份认同。在全科医生的推动下，英国传统的以三等级秩序为核心的医生职业格局逐渐转变为专职顾问医生与全科医生两大阶层。专职顾问医生是在医学领域有专门研究、对疑难杂症进行会诊的医生群体，多由内科医生组成；全科医生则代表着英国社会的普通职业医生，或是外科医生协会会员，或是药剂师协会会员，或持有医学学位，抑或仅仅只是一名医学学徒。

在新的医生职业格局下，化学家、药商群体最终被分化出医学界，脱离了医生身份，英国逐渐确立了以全科医生为主体的医疗保障机制。这套机制偏重基础诊疗，具有医药分家、平民化与重视医疗技术实践的特征，有效保障了平民大众的健康福利与医疗资源的优化配置，为英国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建成福利国家奠定了基础。

1911年，英国政府颁布《国民保险法》，确立了以全科医生为代表的英国医生专家型定位。在此基础上，英国于1945年开始筹建国民健康服务体系，1946年颁布法案，1948年正式建成，确立了全民免费的多极化医疗服务体系。

由于全科医生在英国医疗保障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英国政府非常重视对全科医生的培养。一般来说，一名全科医生首先需要完成5年的医学本科学业，然后在医院各个科室轮训两年，还要接受全科医生专业培训3年，之后再参加国家组织的全科医生资格考试，成绩合格者才能上岗执业。在此模式下培养的全科医生，素质一般来说自然很高。

不过，英国这种医疗制度也并非无懈可击，其最大的问题就是，轻视专业医学，专科医生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专科医生的数量不足，导致



《全科医生：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医生的职业变迁》，王广坤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12月出版

“在新的医生职业格局下，英国逐渐确立了以全科医生为主体的医疗保障机制。

这套机制偏重基础诊疗，具有医药分家、平民化与重视医疗技术实践的特征，有效保障了平民大众的健康福利与医疗资源的优化配置，为英国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建成福利国家奠定了基础。

英国大量病人难以获得专业化的诊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英国医疗改革实践以及医学教育机制调整的经验教训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好的借鉴，而这正是这本书出版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 怀念建筑编辑家杨永生

■金磊

建筑出版家杨永生（1931—2012）离开我们7年了，前些日子在陕西举办的第29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的“新中国70周年纪念图书”展台上，不禁想起了2009年与杨永生先生共同策划出版《建筑中国六十年》（七卷本）的经历。杨永生主编了第一部为中国建筑师立史的《中国四代建筑师》，创办了迄今最受业界欢迎的《建筑师》杂志，帮助工勘察设计大师张轲书写了新中国第一部建筑师自传《我的建筑创作道路》，主持参与指导了数百部建筑文化著作，支持了《梁思成全集》《刘敦桢全集》的编撰出版，还在重病时完成了《叙述》与《建筑圈里的人和事》。

杨永生在离休前的30多年工作中，主持的建筑书刊至少有数百余卷（册），此外他和合作者还创办了《中国环境报》《中国建设报》等，然而他对建筑界更多的贡献还在他离休后的20载时光中。

他曾与我聊天说，他每天早上8点洗漱完毕，吃过早餐，泡上一杯茶，就坐在书房的书桌前。他的书房不大，六七平方米，他称为“北京寸屋”。谈到杨永生的贡献，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原社长周谊说：“……他离休后，不是一般的发挥余热，而像一团不熄的火焰，喷吐强劲……他把他们自己记于建筑界的人和事、思想与主张，写成专著，许多内容带有抢救性质，为中国近现代的建筑设计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今天，我们要向杨永生学习哪些建筑编辑思想？

首先，是杨永生的建筑编辑历史观。杨永生是很注重建筑历史观的，他认为，有历史感的编辑才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开阔气度。这就要求编辑要做历史全程的“守望者”。

其次，是他的文化观。杨永生常说：“从编书交往中感到一个重要信息，就是人们一般对于知识的渴望和对文化的尊重。”强调建筑编辑的文化观，重在看编辑自身的修炼与文化视野的养成，这必然要回归文化的“原生态”，看编辑本人汲取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与养分的深度，建筑编辑的文化观不是“口号”，要看其编辑出

版的书刊是否满足记录历史、传承文明的行业需求。

再次，是杨永生的匠人观。一个书刊的代表人物往往是主编，其学识、胸襟、眼光和判断力，包括他的个人魅力是否具有号召力、感染力，都是极为宝贵的资源和品牌力。杨永生在建筑界及出版界是有旗帜作用的，可贵的是他并不以主编自居，而将视野用在精心打造专题上。

第四，是杨永生的思行观。只有有创意思、才有境界，才有胆识，才可落到文采上，策划即如何学会“发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思考别人想不到的东西，发现你没有寻找的东西”，好的策划重在要敢于改思路，不断地解放思想。

最后，是他的学习观。有人说，杨永生在业界是建筑理论家身份与地位，原因何在？编辑是文化史、科技史、城市史（建筑史）的创造者与书写者，担当此重任的人不学习行吗？我认为，任何一部好著作肯定不是“做”出来的，一定是专业化编审与一线专家拥抱社会、城市、文化的结晶。杨永生不仅非建筑学出身，也非编辑专业，他的高水准与专业化说明他善于学习并总结，从他身上可品到一个基本原理：优秀的编辑大多要具有思想家的品质，优秀的编辑是最善于学习并汲取新知的人。所以，一个有研究性思维的编辑何谈实现不了原创，一个以学习为己任的编辑定会在建筑天地中迸发新作为。



《建筑编辑家杨永生》，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